

行业伦理不仅仅是食品从业者的伦理

冰点时评

传统城市在全球化中消失

邓聿文

中国城市的“千城一面”向来受到诟病,近日,在南开大学主办的一场有关城市形象的论坛上,就有学者炮轰全国许多城市在追求“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过程中,“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涌现出来,成为受人推崇的“地标”,200个城市如同一母同胞。

不过,如果把“千城一面”现象的出现仅仅归咎于在城市改造中,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长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合谋”,则有些太简单。的确,在城市发展中,城市决策者基于政绩需要,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忽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打造张扬性的城市排场“规模”与“表象”,是制造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重要因素。但是,有一个背景不能不提,这就是工业化,尤其是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一体化,也使得城市发展理念、设计思想乃至建筑手段与材料都国际化了,一方面导致中国成了全球建筑师的试验场,另一方面造成“城市流行病”与“跟风热”的泛滥。

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曾这样调侃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在五分之一的时间里设计了十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比如上海,在过去十几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要多。而这些建筑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案,大都直接取材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楼、高密度、大广场”的模式,缺乏城市的个性特征。事实上,“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本身,就是工业化在建筑方面的一大特征。

工业化和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催化剂。现代城市理念在“工业革命”时代萌芽,城市开发模式在“工业文明”四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础上渐变形成,城市规模随工业区扩大而急速膨胀。目前,我国已处在重工业化时代,城市化的稀缺会反过来拖工业化的后腿。因此,当第一、二产业结构比例发生深刻变化时,各地自然走向了一条“造城运动”的不归路。

工业文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工业化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巨大的诱惑力、影响力,打破了地域文化个性赖以生存的空间界限和文化界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在建筑领域,长期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文化一统天下,全球化更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带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由此形成了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我们看到,无论是北京、上海、大连、杭州,还是香港、台北、曼谷、汉城,或是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许多城市都失去了个性,彼此十分相似。可以说,全球化话语的影响,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对全球文化的认同和对当代消费模式的共同追求,使传统城市特色日渐消亡。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建筑市场日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由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对城市文脉的缺乏理解,以及开发商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一种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城市、改造城市的自由。比如,相当多的境外建筑师在处理中国的旧城改造问题时,往往将城市看作一张白纸,把中国当作实现其建筑理想的试验场,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勾画蓝图。而本国的建筑师,要么屈服于西方理念,亦步亦趋;要么为了订单,迎合领导和开发商的意图。

没有思想和个性的城市犹如没有灵魂的人。对于具有几千年城市史的中国来说,如果城市失去特色,将历史文化的底蕴破坏殆尽,“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么,不仅是中国建筑和中国城市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文明的糟蹋。

刘道彩

近日,天津柔道队为防“瘦肉精”自行养猪的新闻在媒体间发酵,并得到广泛的同情与认可。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做法虽然有点看头,还是缺一些技术含量。

按照佟文主管教练吴卫凤的说法,佟文因误服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导致药检结果阳性。但不吃肉对于无差别级不用控制体重的柔道运动员来说简直就是“天灾”,所以,天津柔道队开始自己养猪吃肉。

佟文兴奋剂事件的确实成为前车之鉴,但通过自行养猪而杜绝兴奋剂,虽然很悲情,还是多少有些盲目,而且也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些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佟文染

杨于泽

唯利是图正在引导大量食品从业人员逾越社会的道德底线,使中国人吃饭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食品从业者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个小时。从伦理集训入手,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项新举措。

这自然很有必要,很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食品安全上的胡作非为是一种典型的“相互伤害”行为,卖“健美猪”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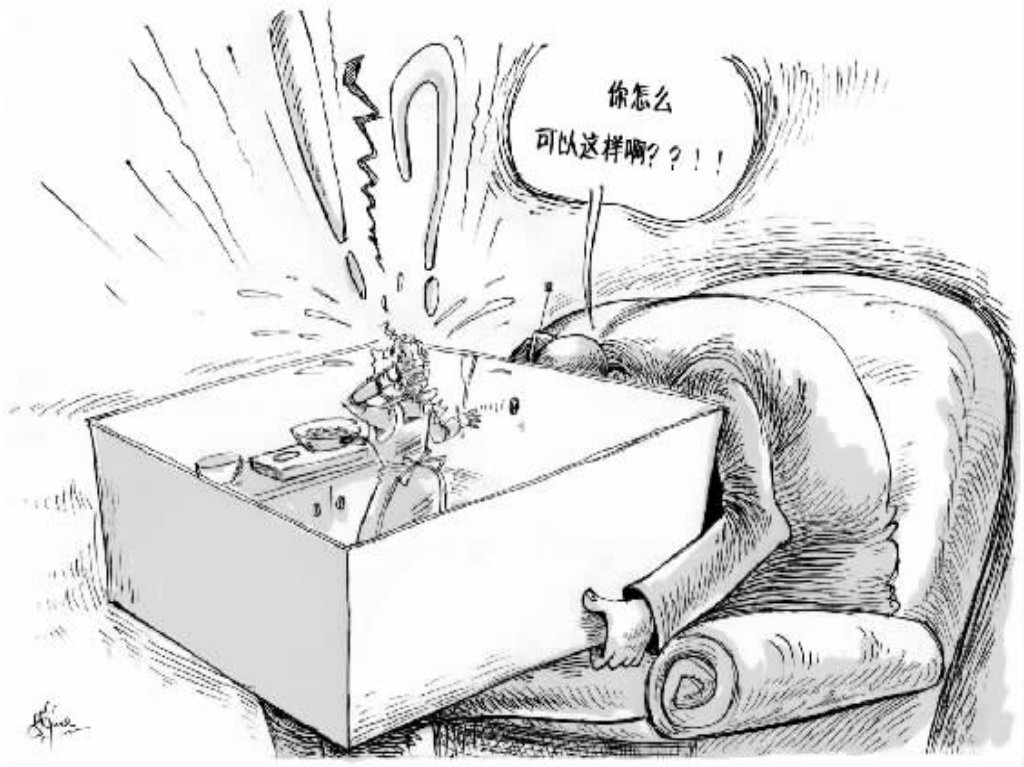
仅可能吃到有毒米粉、有毒豆芽,而且可能吃用到“健美猪”猪肉做的香肠、肉丸子,自己害到自己头上来了。破解“相互伤害”的困境,必须多管齐下,比如加强政府监管、提倡从业者道德自律、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等。对从业者进行法律、科学知识和职业伦理的培训,是推动从业者道德自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说到伦理道德集训,需要一种逻辑上的自足性:谁来主持行业伦理道德集训?进一步说,谁有资格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度上,对从业者进行言传身教?不正视与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职业伦理集训就会变成形式主义,形同走过场。

有人感慨我们社会“道德滑坡”了,

这可能是真的,但在不同的道德领域,情形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年轻人在公共汽车上不给老人让座,大街上有人看见老人倒地不扶,这是“道德滑坡”的表现,而是否助人为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道德自治”,没有法律上的刚性规定。而在食品安全领域,商人们在“道德滑坡”的同时,往往跟一些政府监管部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要么有公务人员跟商人沆瀣一气,要么监管部门“徇情”而给商人可趁之机,总之是法律的外部强制虚置。所谓商人“道德滑坡”的另一面,其实是监管者的“道德滑坡”。

如果主持食品从业人员伦理集训的人自己没有一定的伦理高度,官德不修,则



监控

南京一雇主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以监视保姆每天的活动。(《扬子晚报》5月9日)

漫画:徐简

被竞争淘汰:三流高校的宿命

胡乐乐

据《中国青年报》5月6日报道,伴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放弃报读国内大学人数的迅速增加,目前高考生源呈现出引人注意的持续加速下降的趋势,这种态势将延续至2017-2020年前后。与此同时,最近三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快速增长,预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显然,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将出现生源荒。在这种整体情况下,未来残酷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将使部分高校势必因生源枯竭而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顾海良和朱清时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在持续的生源下降面前,质量差的高校的倒闭将不可避免,高校应该未雨绸缪。

虽然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现阶段不至于出现普遍的高校倒闭局面,但在笔者看来,用不了十年,那些太差劲的三流高校,将面临被市场竞争无情淘汰的危险。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就知道,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必然。近年来,日本少子化

(人口出生率下降)早已全面袭击高等教育,甚至一流的大学,都为争取足够的生源竞相各出奇招,展开“肉搏”。在生源急剧下降的大前提下,为了招生,三流的私立大学将成为“免试大学”,而那些门槛很高的著名大学的日子也将不好过,他们所面临的生源流失状况甚至比一般大学更加严峻。

学生的学费收入,对我国普通高校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想见,一旦生源不足,势必将直接冲击学校的日常运营,破产倒闭将不可避免。尤其是部分办学质量欠佳、社会声誉和就业前景不好的高校,肯定将面临更多惨烈的竞争压力。虽然39所“985工程”顶尖大学不那么依赖学生学费,但生源不足或不够好,都会对他们的发展带来即时甚至长远的影响。高校应该如何应对生源危机?有教育专家指出,首先应练好内功,清晰自己的办学思路和学校定位,着力提高办学质量,同时还要加强学生服务,增强营销推广能力,尤其是网络推广能力,以适应日益加剧的生源竞争局面。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未雨绸缪。

首先是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总管家,教育部主管部门需要立即着手根据刚刚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国家人口统计和预测的权威数据,提前进行周密的研究,科学规划和部署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十年的规模、结构、改革和发展,制定积极主动的有效措施,应对未来的生源荒;其次是大学,特别是那些二三类高校,提早为未来的生源荒做好准备,尽量避免到时候陷入被动。若是动作慢了,生源荒真的来了,那么破产倒闭就不可避免。

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加大国内大学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大力开拓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以国际留学生弥补国内大学生源荒。对大学来说,二三类大学应该提早考虑重组,以规模和特色确保自己在未来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力。与此同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学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在生源总数下降的情况下,好生源的总数也在下降,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培训班造就不出创新型人才

王 丽

近段时间,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城市也推出了相关举措:一是对超常儿童的早期培养;二是对于普通中学阶段采取实验班等特殊教育模式;三是探索高中阶段如何与大学、科研院所进行对接的培养模式。一些重点中学纷纷推出举措,开始进行早期超常儿童的培养,开设各类实验班等。

笔者不禁怀疑:创新型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到教育的本源——我们为什么受教育?首先,教育改变命运。我们也许出身寒微,但通过受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乃至下一代的命运。其次,教育给我们知识。通过掌握这些人类世代传承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获得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教育帮助我们构建一套符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伦理标准,成为一名合格“公民”。

此外,教育还有很重要——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功能,即“认识你自己”。这

句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庙上的著名箴言据说有三种解释:第一,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第二,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世界的秘密,因此,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第三,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之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真正成为自己。

诚然,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实现前两者显然有些难,而第三种则是无法推诿的责任,更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创新型人才”,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之个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而学校教育的任务,就是为这些禀赋的显露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就像为种子萌发提供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并且,教育的效果是滞后的,像农耕社会的春耕秋收,一个孩子能否成为杰出人才,须等他离开校园若干年后才见分晓。

中国人喜欢拿树木来比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自然、宽松的“生态环境”,将一棵树苗挖

出来种在苗圃里不见得能长成参天大树。在一所学校中,人为地制造一个小环境,将一群自诩的“未来创新型人才”集中在一起施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究竟利弊如何,很值得探究。

近些年,民国热持续升温。人们尤其津津乐道的是民国教育的成就。可那个年代的教育家,似乎从来没提过培养“××型人才”的口号,更没听说过哪所高校开设过什么“×××班”,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个年代的“创新型人才”却如群星璀璨,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

基于此,时下过分地提“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个口号,不但触不到中国教育问题的痛处,也有悖教育的本义,且有功利化之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若被过分地强调,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如果我们不从整个教育体制上实行根本性的变革,还教育一个自由、宽松、健康、和谐的大环境,让每一颗种子能够发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自己,那么,无论办多少个“×××班”也无济于事。

从业者很难对伦理集训产生认同感;即使他们从形式上接受了,在内心深处也会视之为“因应故事”。道德伦理,毕竟与人的心理与心灵相关,如果说教育者自己态度不端正,其倡导道德伦理给人以装模作样的印象,接受集训的从业者就不会有对职业伦理的认同感。所谓集中培训,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

所以,在开展对食品从业者的集中培训之前,很有必要先对监管者实行行政职业伦理集训,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现代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从“美德伦理”转向“规范伦理”,强调各种伦理原则融入法律、制度和惯例中,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现代

生活具有更深更广的公共性,满足于“私德之美”已不适应公共生活的现实,各种食品安全标准不再系于从业者的“道德自治”,而是要由政府从外部强制。

总结下来,首先集训监管者有两个理由:一是道德伦理教化者应当是道德伦理的楷模,起码必须是先行者,才能具有道德感召力;第二,在当代语境中,食品行业伦理已经化为政府的食品安全标准,由监管部门强制执行,食品安全不意味着监管者执行不力。食品从业者的美德容易被贪欲裹挟,相比之下,政府监管要可靠一些,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应当集训从业者,但宝还是要押在政府监管上。

四高校专业录取只看“裸分”说明什么

晏 扬

高考临近,日前有报道称,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北京城市学院4所高校招办负责人表示,从今年开始,他们不看加分,只看“裸分”。《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5月6日就此发表蔡正奎先生的评论《为“裸分”录取叫好》,力陈高考加分泛滥之弊,力挺四所高校“裸分”录取之举。该文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裸分”录取的赞许和期盼之情。

不过,细看原报道即可知,在高考录取的提档环节,四高校仍然认可考生的各种加分,仍以考生的总分数(高考成绩+高考加分)作为提档依据;所谓不看加分、只看“裸分”,只是体现在专业录取环节——提档之后,如果某个专业报考人数超过计划招生人数,则依据考生“裸分”从高到低录取,未被这个专业录取的考生,将被调剂到其他专业,而不会被退档、拒录。

显然,四高校所推行的是高考录取看总分、专业调配看“裸分”,高考加分仍是考生能否考上某所大学的关键因素。如此,四高校所推行的改革,与真正的“裸分”录取依然有差距。虽然实际意义有限,但此项改革所传递的信息值得深思和重视。至少在这4所高校眼里,高考加分的实际价值要低于“裸分”。他们在不触犯高考加分政策的前提下,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推行改

明码标价,房地产税费不能例外

朱述古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今年“五一”正式施行。《规定》要求售房单位必须在醒目位置为每套房产明码标价,以打击价格欺诈现象。但从国家发改委的督查看,执行环节并不顺畅。国家发改委近日通报了5月1日后在北京检查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的情况,11家知名地产公司因存在违规行为而榜上有名。国家发改委已责成北京市发改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予以处罚,并持续跟踪相关企业整改情况。(《北京青年报》5月6日)

国家发改委此前曾表示将在房地产领域实施反暴利干预。实行明码标价、一房一价,理当视为反暴利措施之一。任何一项制度都难以堵塞所有漏洞。明码标价的规定刚一出台,就有专家表示悲观。不过以我之见,开发商愈是消极,愈是见证了这一措施潜在的效力。对商品房实行明码标价、一房一价,意在建立一个透明的房地产市场。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由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广泛存在,市场价格也不可能灵敏地反映供求状况,供求状况也不可能灵敏地随着价格发生变化,市场机制可能失灵。时下房价上涨势头未减,固然受供求关系、热钱涌动和土地出让金一路高歌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同样是重要因素之一。建造一套房子,

到底需要多少成本。土地出让金支出多少,建安成本多少,税费支出多少,开发利润多少,开发商心知肚明,购房者却雾里看花。其直接后果,就是购房者很容易被开发商制造的虚假信息蒙蔽,房地产价格无法客观反映供求状况,价格的市場调节功能遭到扭曲。

这种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出台《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至少为购房者节省了部分信息成本。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息成本只是消费者需要获得的一部分。对一套商品房而言,除去《规定》中的有关内容外,还应了解土地成本和税费成本。也就是说,开发商建这套房子,向政府缴了多少土地出让金和有关税费,消费者依然是是一头雾水。

土地出让金和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收入,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公示的主体或许以政府部门为主更为合适。这就涉及开发商信息和政府信息的对接共享问题。既然要求开发商全面公开商品房有关信息,政府就不应该让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费收入成为秘密。不仅如此,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公布的有关信息,政府应该提供可资检验的凭证。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此前谈到打击房地产行业暴利时,曾表示将派员赴各地就房地产开发成本进行调研。试想,如果这项调研成果能够成为公共信息,对于增强消费者的判断能力无疑会大有裨益。

“80后”的主旋律让人吃惊

徐家良

央视“唱响中国”的36首作品正在走红,有这样一种现象:

那首很多人都说好的《永远的姐姐》,是一对“80后”姐妹大琪、小琪创作并演唱的(作曲署名大琪)。词作家一方开始有疑问:你姐妹俩写此题材行吗?事实让他踏实了。

11届全运会主题歌《相亲相爱》,作曲竟是23岁毛头小伙子丁于。当时,应约作曲者达十几人,最后胜出的确是一个年轻的“小字辈”。

那首《心中的力量》,作曲也是一名80后。她叫李菲,2007年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今年也就是二十七岁。“80后”词作家小明认为,年轻人思维新锐,他特别愿意把新词新作交给年轻人作曲者谱曲。李菲的创作境界超出了他的感觉。此作品的中心意思是说共产党人真诚地为国为民,李菲虽然年轻,但对此的理解并不肤浅。

还有总政歌舞团的鄂矛,是那首好

听的《卢沟谣》的作曲,也差不多算是“80后”。

这些年,创作者们写了很多轻柔时尚、情意缠绵的作品,似乎年轻人离“主旋律”很远。现在看来不是。青年完全有能力创新出好的主旋律歌曲。历史上,聂耳23岁就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年龄也不大。此次,“80后”的年轻创造者再次证明,他们的功力和思维并不差,对音乐创作规律有很到位的认识。而且,由于年龄与阅历的接近,他们的创作也更能贴近青年的认可。

作曲家孟庆云介绍,这次“唱响中国”评选,隐去词曲作者的姓名,评委闭起眼睛只听耳朵投票。上面提到的“80后”作者,就是从18132件作品中脱颖而出的。这种匿名评选方式,也给许多领域带来启示:怎样做到只认作品不认人,只认成果不认人,只认贡献不认人。“80后”甚至“90后”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在选拔机制上谋求突破,是很需要的。

“柔道队养猪”有看点,无技术含量

“瘦肉精”是在天津运动队食堂吗?原则上说,国家、省级运动队的食品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运动员平时所需肉食应有专门的绿色养殖场直供,运动队食堂也有着十分复杂的食品安全检测程序,除了常规的检查,还要有反兴奋剂等特殊要求。如果这样的食品都难保证安全,不仅难以想象全国人民的肚子里装有多少“瘦肉精”,运动员吃到的概率也不会低。但事实上,包括佟文队友在内的运动员有几人被查出过这种违禁药?

不仅如此,自行养猪就能保证食品安全吗?事实上,在整个猪肉的供应链上,喂养只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从猪的幼崽选择、猪的饲料、猪的免疫、猪的屠宰到猪肉被加

工成食品进入运动员肠胃,哪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有可能被污染,欲借助自行养猪而吃上放心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更不可回避的是,运动员误服了含“瘦肉精”的内,就一定会倒在兴奋剂检测的尿罐子前吗?著名反兴奋剂专家、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在回答此问题时曾表示:“一般的污染,吃得不算多的话,很难吃出阳性来。”(《上海青年报》3月17日)何况,像佟文这样的顶级运动员,除了教练,还要有队医、营养师负责她的一日三餐,且在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给各运动队的饮食禁忌中,“瘦肉精”也赫然在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如此误服事件,那么,运动队要做的工作就不是简单的养

猪吃肉了,而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监管体系、责任心、或者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热点”不高,公众对此半信半疑,再加上近一段时间纷纷扬扬的“双汇‘瘦肉精’事件”、“运动员养猪”类的报道就越发能激起公众的关注欲望与情绪宣泄,从而产生一边倒的同情与认可。但笔者以为,“瘦肉精”固然可憎,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也该痛斥,但“瘦肉精”不是替罪羊,食品安全无法转移赛场兴奋剂问题,更不能掩盖一些被兴奋剂“放倒”的运动员的真问题。虽然竞技体育的目标是争金夺银、为国争光,但如果失去了诚信,一切都变得黯然无光。